

由点到面的深入透视

——读《刘长卿诗歌透视》

蒋 寅

唐诗研究自80年代以来成绩显著,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的问世,有力地推动了唐诗史研究的进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尽管诗史研究的进步依赖于时段研究的突破,但唐诗艺术经验的总结,唐诗魅力的发掘,却仍取决于作家研究的深入。以往,我们的眼光老是盯着那么几个大诗人,以致忽略了许多历来为人重视、在唐诗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的诗人,其中突出的一位就是刘长卿。刘长卿的创作正处于由盛唐到中唐的转变关头,他的作品不仅显示出唐诗范式的演进、风格的拓展,也体现了近体诗形式技巧的成熟,深为后人重视。明清以来许多标榜盛唐、以开元诸公自许的诗人,骨子里常是学刘长卿,从刘长卿入手的。清代王渔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无论就作品的艺术水准,还是就诗史的意义而言,刘长卿都是个不容忽视的诗人。可实际上他却受到了极度的冷落,自5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更不要说研究专著了。我在1988年读到陈顺智《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中州学刊》1987.4)一文时,就感到他对大历诗歌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的把握甚合人意,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没想到那只是他刘长卿研究的一个导论,近读到他的《刘长卿诗歌透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才让我对他的整个研究有了全面的了解。

众所周知,作家研究虽是个案分析,但同样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文学史知识。一个诗人的特点和价值,只有在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展开的诗史座标中才能准确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研究就是诗史研究的深化,而诗史研究则是诗人研究的升华。在成功的研究中,这两方面一定是相辅相成、互相发明的。陈顺智的《刘长卿诗歌透视》,再一次让我看到诗人研究与诗史研究的转化和相济。对刘长卿这位“生活在盛、中唐两个诗歌高峰之间的重要诗人”,《透视》力求将他置于大历那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来考察。全书三章“生活之域”、“艺术之境”、“大历之冠”,由点到面,逐步分析刘长卿诗作为历史与个人经验的忠实记录,作为艺术探索的结晶在诗史上的独特价值,同时以刘长卿为中心,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大历诗风的嬗变。

在大历那样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任何一位正直的诗人都无法回避社会现实,但由于历史感觉与艺术眼光的不同,他们触及现实矛盾的深度、广度是不一样的。能否认识与理

解作品的特殊意义无形中就成了对研究者历史认识深度的考验。通览“生活之域”一章,我不能不说,作者对刘长卿诗歌内容的理解达到了很深境地。在讨论《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别岑单父》二诗时,他特别提到诗中洋溢的充沛昂扬的战斗情绪、挽狂澜于既倒的迫切心情,指出“无论是当时活动于江南的其他诗人,还是活动在北方抑或上京的诗人,都绝少反映这一现实内容,而刘长卿却为我们保留下这组难得的历史图片”(P8),就是很有眼光的。这的确是刘长卿的可贵之处,他的诗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经历、闻见的一切:战乱的仓皇,城乡的凋敝,民生的艰难。在陈顺智娓娓地将这些内容一一指陈后,作为“战乱现实的侧光镜”、“疲民疲兵的同情者”的刘长卿诗的认识价值就鲜明地凸现于我们面前。在“坎坷生涯的自纪史”一节,作者着重分析了两次贬谪作品中“为自己横遭诬奏表示极大怨愤之余,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吏治和最高统治者不无讽刺之意”(P27),认为由于“在他个人的谪宦之情中含茹着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那个时代一般文人士子的普遍心情”(P28),所以这些作品虽只是表现一个倍受欺凌的封建下层小吏的苦闷心情,却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此论深获我心,我也曾将这部分作品视为长卿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至于其他生活内容,如友情的诚挚、山水的赏悦,咏史体物的寄情等等,作者也一一作了提示和分析。论述刘长卿山水意识的一节,不仅笔墨抒情,分析也很精当,比如谈到风景在诗中的功能,他说:

在完整独立的山水诗中,单句的自然景物描绘是依赖其他句子而存在,并与其他写景句有机结合成一体从而表现山水景物的自然风貌,由此获得独立自主的定性。其他各类篇什里的山水景物由于是依赖诸如离情别绪之类情感而存在,因此这些散句也就失去了作为山水景物的自足性和完整性,只起到渲染气氛、传达感情的作用;因此这些散句也就从自足走向依赖,从完整走向片断,从纯粹的自然表现走向复杂的情感表现。(P41)

这一分析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在我看来,刘长卿的诗中清楚地留下了唐诗范式演进的轨迹,上述分析正点到了这一问题,促使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思考。

“艺术之境”一章包含着作者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的深入

研究,显示出良好的批评眼光。他首先肯定所谓“五言长律”主要意味着近体的创作,继而说明“刘长卿既无陈杜沈宋之‘典丽精工’,又无王孟储韦之‘清空闲远’,却能在五律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全赖他婉转流利、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他的成绩不像初唐诗人那样在开创之功,也不像盛唐诗人之在使之成熟方面,而在使之更加精圆自然,更符合或具有律诗的特色”(P57)。他对刘长卿在五律上的贡献无疑是把握得很准的。通观作者对刘长卿各体创作的评价,我觉得他的结论是可以令人赞同的,唯有五古的评价似囿于前人定论,与实际成就不符。长卿五古在体制上虽非时人可及,但窘于才力,时有捉襟见肘处,我在《大历诗人研究》曾有详论,兹不赘述。陈顺智对刘长卿诗艺术特征的剖析是由意境入手的,他将刘诗的意境分为三类:萧疏阔大的,余韵缭绕的,精细尖新的。这一划分自不可能穷尽刘长卿诗的各相,而且最后一类主要与意象有关,也不是意境的问题,但通过作者对刘长卿作品的分析,已足以让我们看到唐诗意境由盛唐向中唐的过渡,看到“一种追求空灵的新型审美趣味的出现”(P74),刘长卿诗在境界开拓和诗风转变上的意义由此呈现,那就是:“正是在追求精深,锐意创新的审美风尚促迫下,中晚唐诗歌各派分流,竞相趋异,形成争相用长的繁荣局面。刘诗这种意境正是这种审美趣味出现的标志。”(P78)值得称赞的是,作者的结论不是像时下一些论著那样,发自轻率随意的概括,而是都以细致的作品分析为基础,有扎实的诗史知识作支撑。在讨论刘诗婉转流利的风格时,他从深婉不迫的情感、舒缓骀荡的表现两方面,抓住诗人的情感特征、修辞方式来分析,层层深入,探骊得珠。经过体裁、意境、风格的全面研究,作者最终将诗人的审美结构概括为缩虚入实,持实成虚;动静相宜,视听互彰;大小错落,远近转换等主要模式。至此,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的基本倾向被揭示出来,前文的细致分析也由此得到纲举目张的提挈。

通过对刘长卿诗的深入研究,作者不仅认识到诗人在唐诗演进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大历之于中唐诗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有了将刘长卿放到大历诗风的变迁中去考察的“大历之冠”一章。作者指出,刘长卿之所以被历代诗评家视为大历诗人的翘楚,就在于他以突出的创作,深刻、细腻而准确地表现了大历时期急剧变化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及审美趣味:疲惫、苦闷、茫然和落寞的心理,衰顿、萎缩、抑郁的精神,日趋内敛收缩的审美心理……。他将考察推广到整个大历诗歌,逐一论述了其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战乱心态、浓郁的叹老嗟卑、无奈的茫然困惑、寂历的落寞情怀,不仅分析这些情感、心理状态本身,还通过与盛唐、中晚唐的比较,阐明其独特内涵和对晚唐的影响,大有发人所未发。对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作者是从纤细新巧的意象刻画、空疏萧散的艺术境界、工稳清巧的律体风貌三个方面来认识的,通过面的扫描与刘长卿点的剖析相印证,就使刘长卿在大历诗人中的代表性,体现大历诗风的典型性,更加

豁目地呈现出来,让我们对刘长卿、对大历诗风同时获得一个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全书由点到面,在点的解剖中透视面,在面的展开中深化点,使大历诗研究在点与面的交叉中得到了深入。尽管大历诗的研究在最近几年颇有进展,我本人也研究大历诗歌多年,但读了陈顺智的“透视”,我仍然得到不少收获,不少启发。

应该说,《透视》对刘长卿诗歌的批评和对大历诗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我略微觉得遗憾的是作为一部诗人研究的专著,其中没有谈到他的缺点,而那是与他的胜场一样明显的。这也难怪,人们通常总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倾注感情而宽容其缺点。与正文的批评相比,附录《刘长卿诗歌系年考辨》的考证,似乎不够充实详核。大历诗人除戴叔伦、元结外,传记都较缺乏,诗人们的行年大多只能靠交游与往来酬唱之作考定,换言之,考证大历诗人的生平,光熟悉一两人的作品和事迹是不行的,而作者在考察刘长卿生平时大体只摸索他一个人的诗,遂不免带来一些粗疏之处。当然,刘长卿的资料缺乏信史可征,许多结论都是由作品推断出来的,对作品的不同解释会产生考证结论的差异,有时很难断言谁的结论更正确。但《考辨》说,(1)《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鲍侍御是鲍侍郎之误,(2)《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作于永泰二年,(3)《西庭夜燕喜谭事兄拜会》作于大历九年,(4)《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作于大历十一年遭贬初赴睦州时,(5)《登迁仁楼酬子婿李穆》作于任职的第二年春,则显然不能成立。(1)鲍侍御并不误,倒是《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中鲍侍郎误;(2)应为天宝末求官时的干谒之作,李侍郎即李希言,永泰二年礼部侍郎乃是贾至、薛嵩;(3)应作于长州尉时,诗中用“梅仙已误身”与谭事兄“棘寺初衔命”对举,当然是在县尉任上;(4)题明言“却归”,自非初赴,当是推案后归睦州;(5)言“新章已在腰”,明是方加章服,“古树过隋朝”则是淮南所历,当为赴任之前在淮南作,《随州志》载迁仁楼在随州疑后人据长卿诗附会。还有一些可议处,因问题复杂,不再缕述,请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的考证。

时下学术事业遭经济大潮冲击,商业性写作充斥学界,或掉花枪哗众取宠,或抄袭稗贩,言之无物,“宏观”、“理论”、“文化”、“审美”一应要素俱有而就是没有新意的著作比比皆是。学术著作似乎已不是研究成果而成了写作产品。读陈顺智的《刘长卿诗歌透视》,让人感到在朴实的文字中凝聚着作者认真研究的结果。在它的实际成就之外,这种学风首先就是值得称赞的。

作者: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张炳煌)